

试析土耳其文官政治与军人政治的博弈

——基于正义与发展党的执政实践*

李艳枝

内容提要 军人在土耳其历史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曾经通过3次军事政变推翻民选政府，并通过还政文官政府使土耳其沿着凯末尔主义的方向前进。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尽管文官政府和军方极力维持脆弱的平衡关系，但双方在权力争夺、加入欧盟、库尔德问题、复兴伊斯兰文化等方面分歧重重，争端不断。文官政治和军人政治博弈的结果说明了土耳其的军人政治逐渐让步于文官政治，军人干政在可预见的将来很难再发生；尽管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之间的斗争仍很激烈，但已逐渐趋于理性；正义与发展党“保守的民主”模式获得民众的普遍认可，将为中东诸国提供一种民主发展的范式。

关键词 土耳其政治 正义与发展党 文官政府 “保守的民主”

作者简介 李艳枝，辽宁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沈阳 110036）。

近年来，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与军方之间龃龉不断：2010年2月22日，土耳其警方以涉嫌阴谋政变、企图颠覆政府的罪名在安卡拉、伊斯坦布尔等地拘捕了48名军方高官，使得政府和军方关系一度非常紧张。2011年7月29日，土耳其总参谋长厄舍克·科沙内尔（Işık Koşaner）及海陆空三军统帅集体向正义与发展党政府提交辞呈，以抗议检察机关对众多现役及退役军

* 本文系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伊斯兰视域中的宗教对话思想研究”（10YJC730003）、2009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东政治现代化进程研究”（2009JJD770023）的阶段性成果。

官的调查，造成军方和政府之间矛盾进一步激化。正义与发展党政府与军方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使得土耳其政坛长期存在的文官政治与军人政治的博弈更为突出。长期以来，军方以凯末尔主义的捍卫者自居，严密控制着伊斯兰主义和库尔德主义的兴起，以使国家沿着凯末尔主义的轨道前进。21世纪以来，土耳其政坛的重新洗牌使得具有浓厚伊斯兰背景的正义与发展党迅速崛起，并以绝对优势连续3次赢得大选。正义与发展党政府与军方在意识形态、民族问题、加入欧盟乃至军人地位等方面分歧重重，所以深入解读正义与发展党执政期间文官政治与军人政治之间的关系，不仅有助于全面了解土耳其政治发展现状，而且有助于探索土耳其的现代化模式，从而为经历动乱之扰的部分中东国家提供借鉴。

军人在土耳其历史文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土耳其共和国的前身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军事封建帝国，其统治权威与政治合法性建立在开疆拓土、军事征服的基础之上。近代，西方对奥斯曼帝国的人侵首先引起军事领域的反应，现代化改革也在军事领域发轫。在军人的参与下，奥斯曼帝国在形式上确立了君主立宪政治体制。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帝国军官穆斯塔法·凯末尔通过民族独立运动建立土耳其共和国，并携军事胜利的余威实现权力重构。尽管凯末尔明确规定进入政界的军官必须放弃军职，但行政人员的军人背景使凯末尔政权带有威权政治的显著痕迹。

随着民主化进程的开启，土耳其军方以凯末尔主义捍卫者自居，对民选政府进行严格监视。20世纪50年代之后，由于民主党政府不断干预军官的升迁，而且军官的薪水降低、工作环境恶化，部分对政局不满的军官蠢蠢欲动。正如亨廷顿所言：“在个人独裁下变得高度政治化的军方、中低级的官员通常具有成熟的政治观点或政治意识形态，他们对失去的权力和地位愤愤不平，并感到来自新民主政治中活跃的或占支配地位的势力的威胁。因此，他们常常从事各种政治活动，旨在推翻新的民主政权或迫使其领导成员或政策

发生变化。当然最具戏剧性的政治活动是军事政变或政变企图。”^① 于是，军方在1960年5月27日发动政变，推翻曼德勒斯政府。虽然不久还政文官政府，但随后通过的土耳其武装力量内部服务法（Turkish Armed Forces Internal Service Law）明确规定：“保卫领土和共和国是武装力量的职责，必要时可以武装反对内外的威胁。”^② 这就赋予军方捍卫国家主权的职能，为军方干政提供了法律依据。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和政党分化造成土耳其国内政局不稳，军方在1971年3月12日发动了“备忘录”政变，以军方控制的技术官僚政府取代民选政府。70年代末，由于暴力冲突的加剧和伊斯兰复兴，军方于1980年9月12日再次发动政变，通过一系列立法进行政党重组，1983年还政文官政府之后，继续通过国家安全委员监督民选政府。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土耳其民主化进程的纵深发展似乎弱化了军方的政治地位，但是多党政治下政府的频繁更迭和库尔德民族主义、伊斯兰主义的兴起，使诸多民众将希望寄托在军方身上。由于库尔德工人党的叛乱活动逐渐升级，甚至演化为低烈度的内战，军方作为打击库尔德民族分裂主义的主力，其重要性不言而喻。90年代中期，繁荣党上台给凯末尔主义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总参谋长胡赛因·克夫勒克奥卢（Huseyin Kivrikoglu）惊呼：“上万名位于各个层次的公共官员暗中破坏了国家，他们占据各省市的核心职位，正在破坏国家的世俗基础。”^③ 1997年2月28日，军方向政府提交18条建议案，包括限制伊斯兰传媒、关闭私立古兰经学校、控制伊玛目-哈提普学校规模、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等内容，以控制埃尔巴坎政府的伊斯兰倾向。担心失去民众支持的埃尔巴坎政府延缓批准该决议案，于是军方联合新闻媒体、司法机构和商业团体向政府施压，并积极游说正确道路党退出联合政府，埃尔巴坎被迫于6月18日解散政府，这就是所谓的“软政变”。这既说明军方仍然影响甚至控制国家的政治走向，同时也说明军方开始以间接干预代替赤

① [美国] 塞缪尔·亨廷顿著；刘军宁译：《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50页。

② Gareth Jenkins, “Symbols and Shadow Play: Military - JDP Relations, 2002 - 2004”, in M. Hakan Yavuz ed., *The Emergence of a New Turkey: Democracy and the Ak Parti*, Salt Lake City: The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2006, p. 188.

③ Stephen Vertigans, *Islamic Roots and Resurgence in Turkey: Understanding and Explaining the Muslim Resurgence*, US: Praeger, 2003, p. 77.

裸裸的军事政变。

在正义与发展党上台之前的几年内，军方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逐渐下降。1999年6月，军方被排除出国家安全法院；2001年10月，议会修改宪法第一百一十八条，将司法部长和副总理吸纳到国家安全委员会，这就降低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军官所占比例，但是军方的政治影响仍不可小视。1999年大选后，在军方的授意和安排下，支持率位居第三的美德党没能进入联合政府；2001年，美德党被取缔，其保守派和改革派分别组建幸福党和正义与发展党。正义与发展党淡化了伊斯兰色彩，提出了“保守的民主”的政治纲领，以绝对优势赢得2002年大选。正义与发展党执政期间，军方和文官政府进入博弈的新阶段。

二

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军方的政治地位进一步下降。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先是清除了国家安全法院中的军事法官，不久取缔国家安全法院，随后改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由将军担任的惯例改由文官担任。总理和国防部长也改变对最高军事委员会言听计从的习惯，明确表示其决定和其他行政机构的决定一样要受司法裁断。尽管军方和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努力避免冲突，维持脆弱的平衡关系，但是争端频发导致双方关系岌岌可危。

首先，军方和正义与发展党政府极力维持脆弱的平衡关系，尤其是在希勒米·厄兹柯克（Hilmi özkök）担任总参谋长期间，军方和政府尽量避免正面冲突。2002年8月，厄兹柯克将军担任总参谋长，这标志着军方对凯末尔主义认识的新突破。厄兹柯克认为应该坚持凯末尔主义的基本精神，而非对其亦步亦趋的模仿和照搬，因为凯末尔主义只是提供了一般性的指导原则而非具体的行事规范，所以制定国家政策时必须适应社会形势的变化。他还指出军队应该有新的视野，不能仅仅满足于模仿过去，军人应该在拓展知识的过程中适应社会形势的变化。他甚至质疑以前发生的军事政变，“发生在1960年5月27日、1971年3月12日和1980年9月12日的军事政变难道就是成功吗？显然不是。如果他们是成功的，那些禁止参政的政治家就不可能重返政治舞台而成为土耳其共和国的总理或总统，这表明军事干预并非是一个万全

之策，从现在开始我们应该更加相信人民的判断。”^① 2002年大选前夜，有记者问他投票支持哪个政党时，他回答道：“这个问题你不应该针对我的军人身份来问，我不想对政治发表任何评论，我们的士兵应该以公民身份而非士兵身份来投票。”^② 他在大选后答记者问时说：“我们是根据民主原则进行选举的……这样的结果体现了民众的意愿，我也尊重这样的选择。”^③ 不过，他仍然对正义与发展党发出如下警告：军方继续保护共和国免受各种威胁特别是原教旨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侵袭，“2.28决议（1997年）是在某方面过度发展的后果，如果这种事件继续发生，结局将不会有任何区别。”^④ 所以说，尽管厄兹柯克尽量避免与政府发生正面冲突，但并不意味其在捍卫凯末尔主义方面比其前任做得少，而是通过寻求一种谨慎、理性的战略以使凯末尔主义免受威胁。

与此同时，埃尔多安政府也尽量避免与军方发生摩擦，在制定政策和措施时极力避免引起军方反感。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强调政府要和军方保持必要的接触，共同协商解决敏感问题。2003年7月，当正义与发展党议员讨论是否特赦未实施恐怖行为的恐怖组织成员时，埃尔多安说：“你们的决策必须与国防委员会保持一致。”^⑤ 对于土耳其是否向伊拉克派兵一事，居尔指出：“军方对此事的态度极为重要，虽然这并不意味我们将最终的决策权交给军方，因为做出最终决议的必将是政府，然而不了解军方在此问题上的态度也是不合适的。”^⑥ 当厄兹柯克召开新闻发布会指出军方对政府的某些政策表示困惑时，居尔回应说：在民主国家，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土耳其武装力量也可以表达其观点，因为他们是土耳其公民，但他们应该在公开场合表达自己的观点，一旦军方的不满情绪被广泛关注，那么大家会认为或许国家将面临又一次的政治危机。^⑦

尽管如此，军方仍然对政府行为颇有微词。在2003年4月的国家安全委

① Metin Heper, “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Government and the Military in Turkey”, in Ali Carkoglu and Barry Rubin eds.,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urke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Francis Group, 2006, p. 75.

② Ibid, p. 76.

③ Ibid.

④ Ibid, p. 78.

⑤ Ibid, p. 81.

⑥ Ibid.

⑦ Ibid, p. 82.

员会例会上，军方指责政府试图与土耳其海外移民的原教旨主义机构联系，强调“保护世俗主义原则——国家的基本属性之一的重要性”。^①几天后，总参谋部重申其是“阿塔图尔克遗产的捍卫者”，并警告说：“决不可忘记，今天土耳其武装力量的团结和统一和过去是一样的，依然是世俗的、民主的土耳其共和国社会属性的捍卫者，并将仍然服务于我们的伟大祖国”。^②该言论使军方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一度紧张。所以说，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和军方之间保持了一种谨慎的冷平衡关系，一旦超出双方所能容忍的利益界限，冲突便不可避免。

其次，军方和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在诸多方面的分歧导致双方关系微妙，正义与发展党支持伊斯兰文化复兴的行为也使军方如鲠在喉。尽管在民主化背景下，军方和正义与发展党政府都保持一定的克制，但他们对诸多问题的分歧使得双方冲突不断。以加入欧盟为例，正义与发展党政府为了达到入盟标准，先后通过两次修宪和一揽子协议使土耳其的法制体系与欧盟标准接近，这些协议对军方地位做出明确限制：弱化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行政权力而将其转化为一个咨询实体，将国家安全委员会例会由一月一次改为两月一次，审查军方的财政支出，削减国家安全委员会财政预算的60%，给予库尔德人独立的民族权利，将军方代表清除出高等教育委员会……显然，这些对军方地位的直接限制，意味着军方和文官政府之间维持了20多年的平衡将被打破。而军方以凯末尔主义和民族团结的捍卫者自居，反对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入盟改革措施，坚持武力打击盘踞在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工人党势力，造成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在库尔德问题上并不能形成持续有效的政策。

军方对正义与发展党的伊斯兰背景忧心忡忡，对其复兴伊斯兰文化的行为保持高度警惕。2002年11月20日，政府发言人布伦特·阿瑞恩（Bulent Arinc）和戴头巾的妻子一起到机场为参加北约峰会的塞泽尔总统送行，此举引起军方愤怒。11月28日，部分军官在厄兹柯克的带领下对阿瑞恩发出无声警告：前往其在议会的办公室，默默停留了3分钟后离开。2003年4月23日，国家安全委员会抵制了阿瑞恩组织的儿童节庆祝活动。在4月30日国家

① Gareth Jenkins, “Symbols and Shadow Play: Military – JDP Relations, 2002 – 2004”, p. 197.

② Ibid., pp. 197 – 198.

安全委员会例会上,军方代表重申保护世俗主义原则的重要性,强调世俗主义是国家的基本特征。5月5日,军方宣称其是世俗的、民主的、社会的土耳其共和国的捍卫者。^①

军方还抵制了政府的宗教学校改革计划。伊玛目-哈提普学校是土耳其培养教职人员的职业学校,由于国家不能为该学校的毕业生提供足够多的教职,所以许多毕业生尤其是不能担任教职的女生通常选择在神学院和其他高等院校继续深造,但他们在高考中的录取分数线远高于世俗学校学生的分数线。2003年,正义与发展党政府为了使伊玛目-哈提普9学校的毕业生获得平等进入大学的机会,曾积极酝酿改革,但由于军方的激烈反对而不了了之。2004年,军方和政府针对“伊玛目-哈提普学校的毕业生是否享有平等的进入高等学校学习的机会”再次发生激烈摩擦。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宣称应保证伊玛目-哈提普学校毕业生和其他高中毕业生享有同等的入学资格,并通过了相关法律草案。军方指出该草案旨在破坏世俗教育的原则,警告说:“武装力量对土耳其共和国作为民主、世俗和法治国家属性的立场与态度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改变。没有人可以质疑或误解土耳其武装力量在这个方面的看法和态度。”^②

军方和其他世俗机构还认为,该草案旨在简化那些同情政治伊斯兰复兴的骨干分子向文官政府渗透的程序,从而实现国家的伊斯兰化。厄兹柯克指出这一草案违背土耳其相关法律原则和精神,因为有关法律规定伊玛目-哈提普的毕业生只能从事宗教职业,如果进入世俗领域,将会损害国家的世俗基础。并强调说,近年来军方坚决反对修订宪法和其他法律,否则将使土耳其的入盟努力前功尽弃。^③埃尔多安则回应称,此举是为了解决国家面临的特殊问题,而非与公众的需求相悖。“没有人可以对民众意愿施加压力。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将会看到议会的反应,如果议会代表民众的意愿,其决议应该得到所有人的尊敬。”^④议会最终于5月13日通过了该草案,并将其提交塞泽尔总统批准,但塞泽尔总统在5月28日以该草案与世俗主义原则不相符的

① Gareth Jenkins, “Continuity and Change: Prospects for Civil – Military Relations in Turke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3, No. 2, 2007, p. 349.

② Ibid, p. 350.

③ Metin Heper, op. cit., p. 78.

④ Gareth Jenkins, “Symbols and Shadow Play: Military – JDP Relations, 2002 – 2004”, p. 200.

借口否决了该草案，在军方和总统的双重反对下，正义与发展党政府最终收回该草案。由于正义与发展党占议会绝对多数，再次通过该草案并不难，但埃尔多安政府却对将其搁置，充分体现了其务实与理性态度。

最后，军方和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对权力的争夺也使得他们之间的冲突难以调和。自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来，总统多由军人出身的人担任，执政党也无权干预总参谋长的选任。但是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双方相互干预领导权更迭。为了反对强硬的亚希尔·比于克阿纳特（Yaşar Büyükanıt）担任总参谋长，正义与发展党政府于2006年夏天发动抵制比于克阿纳特的运动，通过散布电子邮件、传真等手段抗议其犹太血统，在塞泽尔总统的调停下，比于克阿纳特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其上任后立即宣称：保护共和国的基本原则不是政府事务，而是军方的职责。^①同年9月底，土耳其陆海空总司令相继发表评论，指责土耳其面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威胁。10月2日，比于克阿纳特发表演讲，矛头直指政府，警告说军方不能容忍世俗主义遭受侵蚀。2007年2月14日，他在访问华盛顿时，再次强调指出：“土耳其是一个民主的、世俗的、社会的、统一的国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土耳其偏离该轨道，也从来不会。土耳其共和国是阿塔图尔克创立的，共和国将坚持其奠基的原则，直到时代的终结。”^②这是对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明确警告：不能偏离凯末尔主义的世俗轨道。

军方和政府的权力争端在2007年总统选举和大选中趋于白热化。由于塞泽尔总统任期届满，埃尔多安作为执政党领导人可以援引先例继任总统，但其伊斯兰背景遭到军方和其他世俗主义者的怀疑，所以正义与发展党推出相对温和的居尔担任总统候选人。尽管如此，军方仍然声称如果居尔当选总统，土耳其的世俗性可能会受到损害。所以在总统选举前夕，军方在其网站上语气强硬地表示要坚决捍卫土耳其的世俗主义原则，要与共和国的敌人决战到底。在军方的强大压力下，宪法法院最终判决总统选举的第一轮投票无效，居尔被迫退出总统选举。正义与发展党将原定于11月份举行的议会选举提前到7月份举行，希望凭借强大的民众支持来抗衡军方和其他反对派。正义与发展党再次以绝对优势赢得单独组阁的机会，所以在8月份的总统选举中，

① Gareth Jenkins, *op. cit.*, p. 353.

② *Ibid.*, p. 353.

军方最终接受了居尔担任总统的现实。不过，鉴于军方的强硬态度，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和总统居尔都放低姿态，埃尔多安明确表示新政府将坚决捍卫国家的世俗政体和民主体制，还表示将以国父凯末尔为榜样，为全体土耳其人服务。居尔在就职演讲中宣称将保持中立和遵守共和国已经颁布的规章制度，支持世俗政权和政教分离，独立于各政党之上保持中立，但军方和政府之间的冲突仍在延续。

2010年，部分军官策划的代号为“大锤”^①的军事政变计划被公开。2月22日，土耳其当局以涉嫌策划军事政变为由，逮捕了包括原空军司令、原海军司令在内的多名退役或在职军方高官；2月28日，土耳其军方和政府的支持者分别组织游行示威，军方甚至派出坦克来声援示威者，尽管政府最后释放了部分嫌疑人，但是军方认为这是他们的莫大耻辱，所以双方的冲突一再升级。

2011年，土耳其检察机关先后以密谋推翻政府为由对众多现役和退役军官进行调查，这些人中不乏将军和上校等高官，检察机关还以涉嫌通过互联网发起反政府活动的罪名下令逮捕22名高级军官。在逮捕实施之前的7月29日，总参谋长厄舍克·科沙内尔及海陆空三军统帅集体向总理府递交辞呈，随后居尔总统与埃尔多安总理连夜召集会议，任命唯一没有请辞的军方高层将领——宪兵司令内杰代特·厄泽尔为新的陆军司令，代理总参谋长一职。这场突如其来的辞职风波，暴露了土耳其军方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日深，说明二者之间的权力争夺并不能在短期内化解。

三

军方和正义与发展党政府之间的博弈成为土耳其政坛一道独特的风景，其不仅体现了政治变革中军人政治与文官政治较量的延续，还体现了世俗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对国家政权的争夺。军方作为世俗主义的代言人，在特

^① 据土耳其媒体透露，该计划制定得非常详细，由5000多张扫描文件、幻灯片和48小时的录音组成。电脑文件显示日期为2002和2003年，这些文件源头追溯至军方电脑。在该政变计划中，土前空军司令弗尔特纳同部分军官密谋击落土耳其空军飞机，然后嫁祸希腊，以此激发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并借此显示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的无能。还企图炸毁伊斯坦布尔的清真寺和博物馆，从而引发政局混乱，进而借机夺取政权。

定时期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工具，以军事干预的不民主方式将民主政治推向深入；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在继承文官政治的基础上，通过整合传统与现代文化构建了“保守的民主”模式，推进了现代化进程的纵深发展；这必将对土耳其的未来走向产生重要影响。

第一，军人政治逐渐让步于文官政治，军人干政在可预见的将来很难再发生。土耳其作为一个由军事强人建立的现代民族国家，国家政治生活中渗透着威权政治的痕迹，军人在政治生活中居于重要地位。多党民主制开启之后，军人对民主政治的载体——文官政府的影响仍很深远，高级军官和政客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制衡的关系。作为一个在探索中前进的国家，土耳其的文官政府有时并不能有效地解决国家面临的棘手问题，军方常常以稳定秩序、捍卫权力为名对文官政府施压，甚至诉诸赤裸裸的军事政变将民选政府赶下台，以实现其政治目的。不过土耳其军方并没有像部分中东国家那样建立起军人独裁统治，而是在稳定秩序之后很快还政文官政府，尽管这些文官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军方操纵，但毕竟使国家沿着民主化的轨道继续前进。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军方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逐渐下降：这一方面表现为军方失去对总统职位的控制，另一方面表现为军方对各政党影响力的减弱。

20世纪90年代之前，土耳其由奉行凯末尔主义的政党控制国家政权，为了保证其统治地位，他们都对操控重权的军方采取拉拢政策，军方也影响了各政党的纲领选择。但是自90年代以来，土耳其国内政坛交织的是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较量，军方对伊斯兰政党的影响力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相对较小。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进一步削弱军方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增加国家安全委员会中文官的比例，间接削弱军方的影响；以满足哥本哈根标准^①为借口，弱化军队的政治职能，限制军方对国家政权的操控；

在这种背景下，一度坚持脱亚入欧战略的军方对入盟谈判采取拖延态度。随着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军方也认识到赤裸裸的军事干预不得民心，放弃了直接的军事干预或军事政变，借助各种力量强化其对政治变革的影响。在

^① 哥本哈根标准（Copenhagen Criteria）是一系列用来衡量某国家是否有资格加入欧盟的标准。它是由欧洲理事会于1993年6月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制定的。政治方面，它主要要求候选国有稳定的民主制、尊重人权、法制和保护种族少数、宗教少数、人数的少数；经济方面，它要求候选国真正地实行市场经济；法律方面，则要求候选国接受欧盟法系中的公共法、规则和政策。

2002、2007和2011年大选中，军方通过支持反对党来抗衡正义与发展党；2008年，军方授意宪法法院取缔正义与发展党；2010年，军方发动民众抗议政府逮捕涉嫌“大锤”计划的军方高官；2011年，军方以总参谋长联合海陆空三军统帅总辞职的方式抗议检察机关对众多现役和退役军官的调查。种种行为既是军方政治实力下降的结果，也充分说明军方逐渐接受了土耳其民主发展的现实，而且普通民众也认识到军人干政毕竟“违反任何公认的官场准则，破坏政治秩序的完整性和合法性基础。”^①所以说，在现代化背景下，军方的政治管理职能和政权操控功能逐渐淡化，军人政治让步于文官政治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第二，土耳其军方和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政治博弈说明尽管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之间的斗争仍很激烈，但已逐渐趋于理性。自从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斗争从未停止。军方作为世俗主义的捍卫者在凯末尔时期压制了苏非教团的活动；在多党民主制启动之后，先后以镇压宗教极端主义的名义发动军事政变，以使国家重回世俗主义的发展轨道。1980年政变后，尽管军方接受了土耳其——伊斯兰一体化的思想意识，但也仅仅服务于政治建构的需要。当伊斯兰政党上台可能危及国家的世俗主义属性时，军方联合其他世俗主义势力将繁荣党主导的联合政府赶下台。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军方在处理与伊斯兰主义者之间的关系时逐渐趋于理性，尽管军方对正义与发展党的伊斯兰背景诟病颇多，并在2002、2007、2011年大选中予以抵制和反对，但都在大选后宣布接受民众的选择，并在诸多问题上和正义与发展党领导人达成妥协。这说明只要伊斯兰主义者没有超越其容忍范围和民主框架，军方就不会采取激烈的政变方式来反对之；也说明土耳其逐渐跨越军事政变的特定历史阶段，逐渐走向民主和务实。

军方对正义与发展党的制衡遏制了土耳其向宗教极端主义方向发展；正义与发展党在军方影响下也逐渐淡化伊斯兰色彩，制定的政治纲领更具操作性和现实性。尽管正义与发展党对军方以及反对党的妥协，体现了执政党的现实选择，但也证明其改变了以往伊斯兰政党的狭隘，而趋于务实开放。埃尔多安反复强调民主和宗教是实现人类幸福的工具，“伊斯兰教是我的个人参

^① [美国] 塞缪尔·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21页。

照，我的政治参照是民主。”^① 正义与发展党在3次大选中的绝对优势和政权稳定，说明温和的伊斯兰势力在土耳其已经站稳脚跟，强硬的世俗主义势力逐渐退缩，乃至从主流沦为边缘；土耳其已经超越了僵化的、基于凯末尔主义的现代化之路，而进入到一个强调多元、人权、民主和自由的时代。这既说明当代土耳其的伊斯兰势力和世俗主义者已经在较公平的条件下进行博弈；又说明以军方为代表的世俗主义者意识到仅仅用启蒙主义的单线历史观看待一个处于多元民主时代的土耳其已经不合时宜；还说明土耳其伊斯兰主义者已经改变其保守的政治立场，逐步接受务实开放的政治诉求；显然顺应了现代化的发展趋势。

第三，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在博弈中的优势地位标志着其倡导的“保守的民主”模式获得民众的认可，这将为中东诸国提供一种民主发展的范式。正义与发展党不仅连续3次赢得大选，而且先后控制世俗主义的堡垒——总统职位和大国民议会会议长职位，其“保守的民主”的意识形态功不可没。

正义与发展党上台伊始就提出“保守的民主”思想，埃尔多安曾说：“我们政党明确拒绝成为一个将某种意识形态施加给国家的政党，也不会将宗教道德用于政治领域。”^② “正义与发展党正在试图用一种健康的方式来塑造宗教与民主、传统与现代、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③ “用宗教作为政治工具是对社会和平、政治多样性和宗教本身的损害；正义与发展党旨在整合本土与普遍价值、传统和现代、道德和理性。”^④ 这表明正义与发展党并不反对传统与现代，而是强调二者整合的必要性。“很有必要完全接受现代化，特别是在技术、高等教育、城市化等方面的进步。然而应该首先将其哲学基础、个人主义、世俗化、理性和物质主义与他们错误的实践区分开来，（只有这样）

① Ahmet Yilmaz, “Problematizing the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Vestiges: From ‘Welfare’ to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in Ümit Cizre, ed., *Secular and Islamic Politics in Turkey: the Making of 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8, p. 57.

② Yalcin Akdogan, “The Meaning of Conservative Democratic Political Identity”, in M. Hakan Yavuz ed., *The Emergence of a New Turkey: Democracy and the Ak Parti*, Salt Lake City: The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2006, p. 54.

③ KenanCayir, “The Emergence of Turkey’s Contemporary ‘Muslim Democrats’”, in Ümit Cizre ed., *Secular and Islamic Politics in Turkey: the Making of 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 76.

④ Ahmet T. Kuru, “Reinterpretation of Secularism in Turkey: the case of 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in M. Hakan Yavuz ed., *The Emergence of a New Turkey: Democracy and the Ak Parti*, Salt Lake City: The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2006, p. 142.

才能将其与本地价值结合起来。”^① 穆克德塔尔·坎 (Mukhdetar Khan) 指出, 正义与发展党代表了民主与伊斯兰认同的调和以及用和平方式处理世俗当局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紧张的实例。^② 伊赫桑·达基 (Ihsan D. Dagi) 使用新伊斯兰主义来表达正义与发展党的保守的民主, 称正义与发展党为一个后伊斯兰主义政党, 其社会事务方面保持了伊斯兰身份, 但摒弃了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政治纲领的发展趋势。^③ 这些学者对保守的民主的全面阐释充分说明了其是一种较为进步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必将为正义与发展党提供合法性论证。这种务实而开放的政治定位使正义与发展党不仅获得传统穆斯林——安那托利亚的农村和小城镇居民以及大城市的工人阶级——的支持, 还特别反映了新兴的较为虔诚的中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追求。所以说, 正义与发展党的社会基础既包括从国家福利中获得好处的社会底层人民, 也包括在经济发展中富裕起来的商业中产阶级, 还包括通过民主途径进入国家政治核心领域的大资产阶级, 因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号召力。

在中东局势动荡的今天, 正义与发展党“保守的民主”模式将给中东国家、甚至整个穆斯林世界带来一种可以学习和借鉴的模式, 即在现行的政治民主框架范围内, 既保持伊斯兰的传统价值观念, 又整合现代政治科学文化观念, 领导民众在保持甚至是重塑伊斯兰价值的同时, 实现国家的民主、自由、富裕、繁荣和现代化, 无疑这将对阿拉伯主义和西方主义有所动摇的普通民众具有广泛的吸引力, 必将使中东诸国突破现行的政治框架, 走向基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之路。土耳其长达 80 年的政治转型探索历程是中东国家的一个典型, 从早期的全盘西化到如今整合传统文化与现代理念的现代化探索之路, 必将为中东诸国的现代化路径选择提供有益的借鉴。

① Sultan Tepe, “A Pro - Islamic Party? Promise and Limits of Turkey’s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in M. Hakan Yavuz ed., *The Emergence of a New Turkey: Democracy and the Ak Parti*, Salt Lake City: The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2006, p. 122.

② Mukhdetar. A. Khan, “Islamic Democracy and Moderate Muslims: The Straight Path Runs Through the Middl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slamic Social Sciences*, Vol. 22, 2005, p. 43.

③ Ihsan D. Dagi, “Transformation of Islamic Political Identity in Turkey: Rethinking the West and Westernization”, *Turkish Studies*, No. 6, 2005, p. 34.

Analysis of Political Game between Turkish Civil Government and Military

—Based on Ruling Practice of 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Li Yanzhi

Abstract: Military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Turkey. In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Turkish military has overthrown civil elected governments three times, but it has restored civil governments in order to make Turkey move in the direction of Kemalism. Since 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came to power, though, as far as possible a delicate balance has been kept between the civil government and military, the two sides have many differences and disputes about controlling power, joining the EU, solving Kurdish problem, reviving Islamic culture and so on. The game result between civil government and military suggests that Turkish military politics has gradually given way to civil polity, and military coups will be very difficult to happen again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Though the fierce struggle still exists between secularists and Islamists, it has gradually become more and more rational. The “Conservative Democracy” pattern advocated by 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has obtained widespread recognition, and will provide a development paradigm for countries in the Middle East.

Key Words: Turkish Politics;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The Civil Government; “Conservative Democracy”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詹世明)